

一九八三·七 辽宁朝阳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
专题座谈会文集

辽宁省博物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98

453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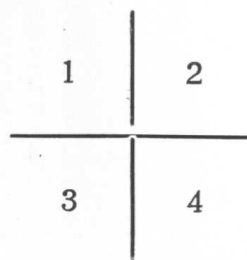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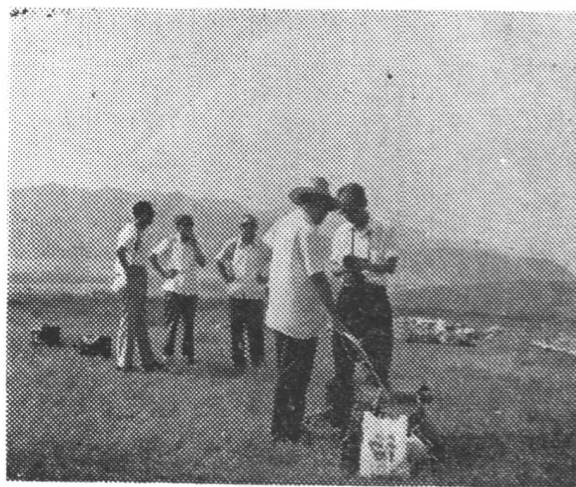
辽宁省博物馆 编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 魏 凡

共青团辽宁省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一九八六年八月·沈阳

22.



1、苏先生观看东山嘴遗址出土文物

2、3、4、与会者在东山嘴遗址进行实地考察

目 次

苏秉琦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俞伟超于 27 日座谈会的发言·····	(7)
俞伟超于 29 日座谈会的发言·····	(9)
张忠培谈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13)
吕遵谔书面发言：浅谈东山嘴遗存的性质和意义·····	(15)
严文明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19)
李仰松谈参观东山嘴祭坛遗址和水泉出土遗物的感想·····	(23)
黄景略于 27 日座谈会的发言·····	(27)
黄景略于 29 日座谈会的发言·····	(28)
郑绍宗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30)
李逸友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34)
刘观民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35)
殷玮璋的书面发言·····	(36)
徐光冀的书面发言·····	(38)
刘晋祥的书面发言提纲·····	(39)
辽宁喀左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介·····	(40)
辽宁建平水泉遗址发掘简介·····	(45)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专题座谈会纪要·····	(59)

苏秉琦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上午和下午几位同志发言的大概意思我已经知道了。谈论的内容都很精炼、深刻，时间就这么多，难于再深入谈下去，不能不感到遗憾！现在已是四点钟，我的讲话估计将不超过两小时。

在这次开会以前，把今年五月份在郑州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上，我的一个发言提纲给大家复印了一下，作为背景材料。这个发言虽然是针对那次中国考古学会年会的内容谈的，但所谈的问题，涉及的则是这门学科发展到现在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跟我们这次会结合起来。所以，这次会既是去年在张家口蔚县开的那个小会的继续，也跟今年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所谈的问题有衔接关系。我们不妨这样讲，中国考古学会年会涉及的是全国性问题：夏文化、商文化和全国各地青铜文化，我们这个小会呢，谈论的范围是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或者更确切一点说，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考古这样一个大课题的座谈会。拿这样一个考古学大课题作为一次座谈会的内容，这种做法是我们完全自发的、自愿结合的，我们想尽量少惊动一些领导同志，而来的人依然是相当精简的，没有论文，省钱、省事，不讲形式，求实效，时间不长，但谈的是共同关心的大课题。

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把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作为一个专门的考古学课题，是怎么样提出来的，和我对它的认识过程。

首先，这个课题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来的。所谓“特定的历史条件”是什么呢？可不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概括：一是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一是社会对我们这个学科发展的需要，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我们提出这个课题就是不合时宜的，大家也没有积极性，也很难期待会出什么成果，开这个会就没有基础。什么是它的基础呢？还是这两点，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如果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人民就会支持它，党会支持它，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们会支持它，那么它就会有生命力。对我们每一位考古工作者来讲，无论哪一位，都永远不应把考古工作与本学科发展需要分开，不能同社会需要分开。不要认为，我们的工作与社会无关，与学科发展无关，与国家大事无关，如果真的以为什么国家大事、人民大事、四化不四化，都同我们的工作没有关系，真的认为我们搞的就是冷门，那还有什么力量支持你，让你锲而不舍地追求下去，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让你去钻研这些课题呢？所以，我认为，当我们从这两个需要出发，认真思考我们具体科研课题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离开本学科当前的发展方向、目的、目标、道路和方法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不认真对待的话，那我们进行科学研究，就谈不到计划性、目的性，而只是盲目性的工作。

第一，关于学科发展的方向、目的。

学科发展方向。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工作虽然总是有局限性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这个学科本身的发展方向,这是我们每一个考古工作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不一样,三十年代时学科发展方向是什么,那是一回事,现在是八十年代,考虑学科发展方向问题,不能脱离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脱离开社会现实。我们今天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就是社会的、历史的产物。建国初期,我们开始学习马列主义,觉得我们的学科应从头开始,但如何开始,谁也不清楚。经过五十年代几次运动,社会对我们学科的压力、影响越来越大了,对学科如何发展,还是茫然。学科与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结合,想来想去,还是学习苏联老大哥吧。学莫斯科大学的教材、教学计划,翻译苏联大百科条目、苏联考古学,都是那时搞的,等我们学过一段以后,觉得还是不解决问题。搞博物馆工作也好,搞大学教材也好,就只知道重复讲些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当中的一些道理。以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其实,那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思想,代替不了考古学。从对苏联的教学实践的学习中,发现他们也不过是先讲历史唯物主义,后讲考古学,对两者如何结合,或者说考古学如何马克思主义化,他们确实没有能够给我们提供一套成功的经验。最后结论是,我们只能走自己的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就我个人讲,还是“史无前例”的那个时代,虽然时间浪费不少,给我们的震动也很大,但毕竟有那么一段充分的时间,可以老老实实在地思考一些问题。反复思考,建国以来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想搞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没有搞出名堂来,怎么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学科结合起来?一定要想通!我就不信非靠别人抱着才能走路,国家大事如此,一个人、一个学科也一样。这个问题明确起来,是1975年听到胡绳同志在我们院部的一次报告之后的事情。他的提法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魄的中国学派,包括各个学科。从那时起,我对我们考古学发展方向问题,得到一点启发,更具体化了,明确化了,就是说,我们应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并不是一个空中楼阁,不是高不可攀的。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任何一门学科,要搞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来,其影响就将不限于十亿中国人,而将会对整个人类发生影响,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民族文化中产生的,虽然在中国没能起到更大的作用,但它对整个进步人类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则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说,在中国这块大地上,任何一门学科,不管它占多大比重,要真正搞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来,它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将会具有更广泛的意义,这一点谁也不应妄自菲薄。我们这个学科,经过这么多年的动荡、反复,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现在提出这个口号,依靠我们大家的力量,包括我们老、中、青在内的这一代人的努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我们是完全有能力有条件做到的。我们拿它来作为我们学科发展的方向,不应是一句空话,而是经过努力奋斗,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大家对学科发展方向真正这样理解的话,那就会成为我们学科发展的动力。

学科发展目的。考古学通论开宗明义第一章少不了要讲考古学对象、任务、目的。

是不是随便从哪本书中抄来一条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呢？不那么简单。目的当然是指社会目的，即社会效果，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是不可捉摸的。例如：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本来是一支电影插曲，解放后成为我们的国歌，前些年几次想改没改成。为什么它有那么大的生命力？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改没改掉？不曾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很难理解。“九·一八”事变以后，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危险的时刻，《义勇军进行曲》一下子把人们的心抓住了。这不是偶然的，是人民的投票，无形的投票。我从这里体会到，说学科目的，不应是不可捉摸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抓不住这个东西，我们就抓不住要害，那我们的工作就是盲目的，作计划，也是没有目的的。所以，我们提出学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是随随便便的，不是为了装饰好看的，给别人看、给别人听的，而应是明确的、认真的。从对学科的认识出发，是自己真心实意相信，要把它作为我们工作的指针或信条，并用它来检查我们工作的总成绩是大是小。我个人认为，在这里只借用毛泽东同志的半句话：“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作为学科的目的就够了。这半句话字不多，分量很重，有千斤重，不但今天重，百年以后也是很重的。因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将永远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重大任务，这应看作是本学科的最终最高目的。现在中央要求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文物工作对爱国主义教育能起多大作用？是不是地下挖出多少宝贝就能起到教育作用？当然不是只靠这些死东西，还得靠理论工作。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顶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的学科要达到本身的目的，也得靠理论思维，只靠那些宝贝，达不到这个目的，倒是理论思维更重要。所以我们的工作挖出多少东西，写了多少文章，那是一回事；还要问到底理论上有什么建树？社会效果如何？我们明明做的应是理论工作，如果不发展理论，不按照学科自身规律办事，这样下去，拿什么来发展学科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关于学科发展的目标、道路和方法。

前面谈到学科发展方向、目的，是从社会意义讲的。学科发展的目标、道路、方法，则是从学科自身发展的任务来讲的，是由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

学科发展目标。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概括我们现在的任务：建立新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通过它来阐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轮廓，并以它为骨骼系统复原起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这个提法，我认为是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不是高不可攀的。

学科发展道路和方法论。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方向、目的和目标，我们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谈到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就不能不涉及到对我们这个学科三十多年的发展和成就的评价问题，到底如何评价？值得讨论。在我看来，我们三十多年来学科发展实践的经验，是最重要的一条。在学科应走的道路问题上，我们应该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我在前面提到那十年动乱中有充裕时间考虑学科问题的时候，就考虑到：考古

学文化的划分，是个关键问题。这讲起来简单，但当我们思想上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它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时候，再挖多少宝贝，对实现学科的发展方向、目的、目标等等，都将是一句空话。

要解决考古学文化划分问题，我们的考古学方法论必须向前推进一步。所以下面我们谈谈学科发展的方法论问题。

前面引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的那句名言，我们的学科同样需要“理论思维”，要具体化，其中就包括方法论。我们学科的基本方法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段、二十世纪初建立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要在本学科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这不是指的考古学应同自然科学结合，要应用新的测试手段等等。同其他学科交错，边缘学科相互渗透，这是近现代各学科领域的共同发展趋势，不是哪一个学科特有的问题。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是在原来基本方法论的基础上，如何向前发展一步的问题，如大家常讲的关于考古学文化问题、年代分期问题等，因时间关系，有关方法论问题这里不能多讲。简言之，如谈分期，只能是首先在同一文化范畴内探讨，不能把不同的文化，只要有早晚关系，就串起来打通搞分期，而我们有些同志，在谈论年代分期时，有时似乎忽视了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分野。又如，在讨论考古学文化时，有时似乎忽视了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的本质，应是一个运动的事物发展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或一成不变的种种事物或现象的堆积。所以，只有具备某些相对稳定的文化特征因素从头到尾的发展序列和它们之间的平行共生关系的代表材料，并认识到它的规律性时，才能明确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形态。我们在考古学方法论上迈进了这一步，从揭示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来源、特征、社会发展阶段性和去向，各自的运动规律，各自同周围文化的关系，以及每一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分化、转化等方面入手，那我们就可能正确地划分考古学文化，那么我们所说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考古学体系，就具备了牢固的基础和丰富的内容。

总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一切科学方法的灵魂。考古学是历史科学，归根到底，它所研究的对象只能是“具体的历史”。一个“群体”的人们所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材料所反映的，就是“具体的历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如果我们嫌麻烦、简单化，那就等于取消了考古学。

以上所谈关于学科发展诸问题，可以作为我们这次座谈课题提出的背景的参考材料，所以多谈了一些。下面谈一谈我对这次座谈课题的具体认识过程。

一九五七年北京大学学生实习，在石家庄平山县采集一些标本，彩陶纹饰具红山文化特征，我看后的一个突出印象是，与我们在黄河流域、即沿陇海路所看到的仰韶文化不同，而和北方的关系密切，因材料不多，当时也没有考虑如何做下一步的工作。以后，1973年到藁城台西看过河北同志工作材料，回到北京，文物出版社同志邀我讲一讲看法，我讲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台西看到的，要说是相当二里冈期商文化也可以，但要说是同一回事，不见得确切，以后报告作者邀我为台西报告写序，我主要讲了两点：第一、如果说台西遗址年代可以同郑州二里冈对照比较，二者文化上有关系，这一点可以

肯定；第二，但从对文化特征的分析，它同晋中和北方长城地带有关联的一面，不容忽视。这样，就在中原地区所谓夏商周的中心范围边缘上，找到一个界限，南边邢台、邯郸、安阳、郑州可以联接起来，邢台到邯郸间京广铁路的这一大站的间距，好象是一个模糊界限，它不仅是这两个地点之间的界限，而且是两个大块块的中间地带。这又是一个认识过程。与此同时，六、七十年代在昭盟地区作了不少工作，有新进展，如对两种新石器文化、两种青铜文化的认识。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地区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性质的文化，它们相互交错，相互影响，也就会有一个相互转化的过程。我们在昭盟所看到的特点，也可能就是长城地带的特点，有它自己的运动规律。别的地区也有交错，另有特点，也可能是进进出出，那是另一回事，规律性是有区别的，我们想要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不能拿一个地区、一个公式，就简单地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中华民族的形成如何如何，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如何。中国是一个“大陆”，文化不会是清一色的，“统一”从来就不是清一色，清一色从来也“统一”不了。我们在昭盟看到的这一现象，是指这个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运动的一种规律性现象，不是指哪个文化有些什么东西，象咱们在朝阳看到的那种彩陶，辽东半岛也有，那是文化关系问题，四面八方都有关系，我们讲的不是一般文化关系，讲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运动规律有它的特点，社会历史发展有它的特点。这个规律本身，是在这个块块内，而不是在块块外。我们这个块块的范围，经过这些年的工作，基本可以划出来，那就是：北起西喇木伦河，南至海河，东部边缘不及辽河，西部在张家口地区的桑干河上游古代“王城”蔚县一带，已接近这个块块的西部边缘，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一下，这个地区，即朝阳、昭盟、京津、张家口，加在一起，它的文化发展的规律性特点突出表现在：同一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交错存在，不同的群体在这里交错，但是，有一个重要特点是，这里有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和燕文化。这三者在空间上大致吻合，在文化传统上若断若续，尽管变化很大，但又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这恰恰是我们这个广大地区在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也是我们为什么把这一广大地区作为一个大课题来研究的原因。我们的任务是要把这条错综复杂的真实历史链条联接起来，粗略看起来它们的中间环节倒有些象北京地区气象预报，白天风向常常是北转南，夜里风向常常是南转北。一年到头，来回摆动，但在摆动中，却有某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不过它不象糖葫芦，而象是一根无形的棒儿，这正是这个广大地区四个块块范围内，需要共同探索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给以理论的说明，将意味着我们这门学科前进了一大步。那就将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一把打开长城地带古文化发展脉络的钥匙，并且找到了联结我国中原与欧亚大陆北部广大草原地区的中心环节，和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我国北方地区在缔造我国古文明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奥秘。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连串问题似乎最集中地反映在这里，不仅秦统一前如此，就是以后，从五胡乱华到辽、金、元、明、清，许多“重头戏”都是在这个舞台上演的。如果我们不能从这里的考古工作取得突破，而还是搬史书，查“四夷传”，恐怕永远也回答不了实质性的问题。

但我必须再申明一句，这不是结论，而是我们工作的开端。如果说时至今日，我们

向前走了一大步，那么，离下一站还有很大距离。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在今天工作成果的基础上起步，从这个认识上起步，而不是再走回头路，我们开这个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交流总结经验，少走弯路，发挥集体力量，协同作战，省、地、县、大学、不同单位、不同系统，力量使在一处。如果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永远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目标。要协同作战，首先认识要统一，把过去的经验成果变成大家的共同财富，这样才能有一个新的起步。

下面讲第二个大问题：朝阳地区考古工作的成果、材料、线索、课题。

经过两天时间，一天看喀左东山嘴，一天看建平水泉、朝阳魏营子，这两批材料有代表性、典型性，是重要线索，也提出了问题。头一个，喀左东山嘴，好象提纲挈领，是一个重要线索，抓住这个线索，围绕它，找遗址、墓地，找来龙去脉。中国之大可以划分为许多个块块，别的地区还没有发现过这样一处遗迹，可以早到五千年前。所以，东山嘴的发现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我们就要追究下去。朝阳地区取得的这些材料，说明辽宁省由省地县结合，搞普查，在面上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成果，如果没有面上的成果，如果不是我们的工作有一定水平，那这样的成果是出不来的，就是有这些遗迹摆在那儿，不认识它就发现不了它，不是任何人看到它就能一眼看出它的重要性。从这点看，我们在面上的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是很可贵的。同时，我们积累的资料也已经不少，但还有些待研究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的工作。朝阳地区在辽宁省范围内是一个地区，在燕山南北这一大块中只是一角。但在这个大范围内，有它的特殊的、突出的重要性，这是不需怀疑的。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能不能讲有这几点：

一、本身自成系统。红山文化可以用一个概念概括，但朝阳地区的红山文化，或者说，以喀左东山嘴为线索的红山文化，它的来龙去脉，不一定是属于笼统的红山，而更可能是属于曾在东山嘴附近地区活动的那一个人民群众，这个遗迹现象背后的人是谁？我们不必同整个红山文化扯在一起，它自己会有个来龙去脉，生活的地方也好，埋死人的地方也好，小玉龙、绿松石的玉鸟也好，它们的来龙去脉都要在这个附近范围内去找，现在说的红山文化毕竟是大的概念，并不能说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一定真的已经形成一个共同体，不过是文化面貌相似而已。东山嘴所见到的红山文化的来龙去脉要首先在这个范围附近去找。

又如魏营子的材料，很有意思。不必同夏家店上层文化划等号，不必就说它是上层文化的前身，不妨单立“帐户”，马上归并一起，没多大道理，还是要找它本身的上下联系，本身的来龙去脉。

二、是联结北边昭盟与燕山南侧的重要环节。从地理位置看，朝阳地区恰恰是燕山南北的重要联结点，这个环节很重要。起初，我们想在张家口探索这个问题，实际证明张家口是通向河套、西蒙古和山西的三岔路口，我们这个路口则是通向青龙、迁安，与京津地区联上了。

三、它又是联结燕山南北这一大地区与辽东、东北、东北亚广大地区的重要环节。它同辽东当然有密切关系，东北三省西部长廊，包括哲盟、呼盟，还有辽、吉、黑三省

西部的一大块地方，不能不从朝阳地区说起，它的位置重要性就在这里。就是说，它不只是一方面的文化关系，同昭盟、承德、京津张，这是一种关系；还有另一种关系，就是辽东以至东北三省。

总之，朝阳地区的考古工作大有可为。大家要有共同认识。在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省地县，还有省外力量，大家协同作战，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长期坚持下去，我相信一定能够达到目的。今天我们能够开这样一个会，朝阳地区全力以赴，说明地方同志重视这个工作，我们大家珍视我们的这次学术活动也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工作的开展的，这也预示我们的工作将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不但这样想，也这样相信，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可能会有同感。谢谢！

（根据讲话提纲和录音整理，经先生修改审定。 郭大顺）

俞伟超于27日座谈会的发言

去年的张家口会议我没有到，有关这里的消息是最迟钝的。我是在到喀左前的几个钟头，在火车上才知道有东山嘴这个发现。昨天看了一点出土的东西，下午去发掘工地，今天又再次去工地看了一下。有了这两天的见闻，才知道大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全国考古界等了三十多年才被发现的重要材料。这就是一些新石器时代的妇女陶塑像以及同这种塑像有关的一片祭祀遗迹。

在欧洲，早就找到过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妇女石雕像；后来，不少学者把它看成是母权制的象征物。从五十年代起，大家便期望在我国也能找到这种东西；现在，在东山嘴终于找到了。这个遗存，根据所出陶片，属红山文化，大体是红山后期的，距今约五千年左右。这个时代，在燕山南北，或者黄河上下，或者是更广大的地区，应该有很多原始祭祀的遗迹，但过去却没有发现。东山嘴的这个遗迹，应当是属于这种性质的，这对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来说，当然具有重要意义。

东山嘴是个小山嘴，这个山嘴嘴，基本上被一组石头建筑遗迹所占满。山嘴的南端，有一个或二、三个卵石所砌圆圈圈。现在所见有三个圆圈，但可能是先有一个，后来遭到损坏，又再砌一个，同一时期也许只有一个。究竟同时有几个，当然只能靠层位关系来解决。山嘴的北部，中心是一个巨石所砌的平面作长方形的方框框，方框中间立了一大堆石头，没有铺满，当时也不一定铺满，有的站着，有的卧倒，可能是后来才倒下的。在这个方框里面，没有见到一点柱础、柱洞痕迹，可见不是有房顶的建筑物，而是一个平台式的祭坛。方框的左右两边，各用褐色岩石砌出一个长条，北端似遭破坏，因尚未发掘完毕，是否合拢，还不能判定；南端则是敞开的。这两条褐石长条，颇似为祭坛所加的边缘。褐石长条的外面，又用灰白色的石灰石铺成向外倾斜的斜坡。这里

已紧靠山嘴东、西两侧的陡坡，把这种石灰色的斜坡看成是祭坛的护坡，应当问题不大。从南端的圆圈圈到北端的方框框之间，是一片空地，整个山嘴，显然就是一个公众活动的场所。

从遗迹形状看，圆圈圈和方框框的意义，当然不同。在圆圈圈的周围，曾发现了几个妇女陶塑像，那么，这种圆圈圈就可能是供奉妇女陶塑像的祭坛。

这种陶塑像，从残缺看，似皆裸体，大肚子。这种特征，和欧洲发现的妇女石雕像是一致的。大肚子的特征很值得注意，应当同祈求生育有关。在原始社会，或者是接近原始时代的部落中，祈求生育常常是人们的一项重要活动。例如现代我国贵州东南部的苗族，还流行一种吃牯脏的活动，十三年一次，妇女们到神庙中取下贴在墙上的用面团捏成的男女像或木雕男女像，祈求生育。所有男女像，都是裸体的。

在母权制的农业部落中，把妇女像作为崇拜的神像，还可能具有另一种意义，即它们是农神的象征。美洲的一些印第安人，当年曾把对生活有重要关系的三种农作物——玉米、土豆和南瓜，作为农神，而祭祀时以妇女来代表之。从东山嘴陶塑像的形态看，能够直接表现出的含义是生育神，但联系到红山文化的生产状况看，也许是农神，还可能兼有两种意义。对五千年以前的农业部落来说，生育神和农神都是会有的。

长方形的祭坛，则应当是祭祀地母的场所。在原始的农业部落中，人们因为依靠农业来维持生活，见到农作物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便以为农业收成的好坏，在于土地神的赐予，于是，普遍信仰土地神。在民族学资料中，这种土地神往往称为地母。地母崇拜在我国亦当发生于新石器时代，后来，一直延到近代，三十多年前各地农村普遍存在的土地庙，就是地母崇拜的遗痕。

据大量文献记载，在商周时代的黄河流域，这种地母神，主要用树来代表，原因大概在于树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庞然大物。但是有的地方是用石头来代表。古籍中有关用石头作为地母神的记载，皆指我国东部地区而言。近十年来在我国东部地区就发现了两处祭祀石头所作地母神的遗迹：一是徐州附近铜山县的丘湾，时代相当于商代的安阳殷墟阶段；一是连云港的将军崖，时代不大好确定，从祭坛上的石刻岩画看，我以为也是青铜时代的。值得注意的是，用石头来作为地母神，正是亚州大陆太平洋东部地区所流行的。除了上述两处青铜时代遗迹外，江苏丹徒县的农村中，直到近代，还往往每村立一个妇女石雕像作为地母神；在朝鲜半岛上，立一块巨石作为土地神的习俗，也至少沿袭到中世纪。如果从更广泛意义的巨石祭祀现象看，在整个环太平洋地区都是流行的。东山嘴这个地方，或者说红山文化的分布区，正是属于我国东部地区的，在这个地区用石头来象征地母，无疑是合乎情理的。

一个山头，上面既有祭祀生育神或农神的祭坛，又有祭祀地母的祭坛，对于处在母权制阶段的农业部落来说，当然是最神圣的场所。对五千年以前的红山居民来说，要修建这样一大片祭祀场地，显然要花费巨大的劳动量，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恐怕难以承担。这个山嘴上，除了祭祀遗迹外，并无生活的居住遗存；而在附近的一些地段，也缺乏同时期的生活遗址。这就提供一个信息，即当时的居民大概要跋涉好多里路到这里来进

行祭祀活动，而这个场所，又大概不是一个氏族——部落所专用的。既然这是一个由若干氏族——部落所共用的神圣场地，就可能是一个部落联盟的最重要的集合地。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的一些青铜时代或更早的遗迹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英国有许多巨石遗迹，就是离开住地的祭祀场地。了解到这一点，也许会对我国的许多新石器时代部落一定会有种种规模很大的祭祀活动，而在她们的住地遗址中又难以发现这种祭祀遗迹的现象，有所启示。

在我国，东山嘴的这种祭祀遗迹，是迄今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处。我们有义务尽可能地作现场保护。人类智能的发展是无限的，今天看不懂的东西，将来有可能看懂，今天判断错误的，将来会纠正。我们保留现场，就便于对这片遗迹的认识，愈来愈正确，愈来愈深入。

俞伟超于29日座谈会的发言

到这里参加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讨论会的，别人都不是首次来朝阳，我则是第一次，自然对材料最生疏。但也有一个因缘，就是在1961年，即赤峰药王庙简报发表的前有，到昌平雪山发掘了一下，遇上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因为这个因缘，以后虽然一直没夕直接接触这方面的工作，却总是有些兴趣，所以也愿意讲一点话。

刚才好几位同志都谈到要探索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及其区、系划分这样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讲到燕山南北有差别的问题。我可以补充一小点，就是昌平雪山的夏家店下层，跟这一带的水泉遗存也好，大甸子遗存也好，是有一定差别的，把燕山南北划为不同的区域类型，确实是可以的。但是就我这个并未专门从事过夏家店下层文化分析的人来说，却想到一个另外的方面，即应当怎样来看待这种文化的共同性问题。

考察一个考古学文化，自然应包括共同性和区域性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问题。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分为两个区域类型，是因为两个类型既共有区别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又各有自身特点。现在，大家一般是把辽西至京津一带作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分布区。但如果远远扩大观察的空间范围，比较同时期许多考古学文化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就会感到具有这种文化的主要特征的遗存，不见得仅仅局限于燕山南北，而是面积还要大得多，区域类型要更多些。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一系列特征中，最富代表性的器物，无疑是一种筒状鬲。这种鬲，在刚才看到的水泉遗址第五层中有，大甸子有，雪山有，其它的许多夏家店下层的遗址中也有。它们是用泥条盘筑法做成一个圆筒作器腹，又单独作出三足和口沿，再拼接成一体，三个袋足则还要加上足根。仅从这种制法过程来说，西北青铜文化中的一种带卷沿的袋足鬲和许多地方的殷式鬲也是这样的，但只要所属文化系统不同，每个部位的大

小比例、形态及纹饰，则各有特点。夏家店下层文化筒状鬲的特征是：腹部特别长，三足的下半部突然往外鼓出一点点，表面又往往是磨光的素面陶，有的还带彩绘。

具有这种特征的陶鬲，其实从辽西地区起，向东南可一直分布到山东半岛乃至苏北的海滨。在山东一带，近年确定了一种晚于龙山文化的遗存，即所谓岳石文化。目前所见最早的岳石遗存似乎无鬲，但稍晚一阶段就有鬲，形态同这里的夏家店下层鬲有一望即知的相似性。这种遗存，东至长山列岛，西至鲁西南，严文明等同志推测为东夷遗存，应当是没有问题的。对岳石遗存有了这种认识之后，必然会引起另一种新考虑：燕山南北的表现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部落，同山东半岛的东夷，又存在一种什么关系呢？

谈到这种考虑时，还应当介绍一个情况。1981年夏，为了孔望山摩崖造像问题，我曾到连云港去了几天，在那里的文化馆中，看到两件红褐陶鬲。一件的腹部比较瘦长，颇有夏家店下层的风味；另一件似可晚到安阳殷墟阶段，但还有一点夏家店下层鬲的余味。长期以来，我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族属问题是迷惑不解的，但一当看到连云港的那两件鬲以后，立即脱口而说：“夏家店下层是东夷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在历史上的夏、商至周初，从连云港一带经山东半岛到燕山南北，曾是所谓“九夷”的活动区。把这一片区域的部落集团叫做九夷，是因其中种姓繁多；东夷是一种统称法。

当时，我对岳石文化的具体面貌还不了解，只是从地理位置上估计在燕山南北和东海之滨中间的山东半岛，也是会有这种筒状鬲的。在离开连云港返回北京的归途中，于淄博市博物馆又见到一件在临淄县城以东桐林遗址中采集的素面橙红陶筒状鬲，便确信在地域分布上，燕山南北的筒状鬲同东海之滨的筒状鬲是连成一片的。今年之初，我看到了长岛珍珠门发掘出的岳石文化的筒状鬲的实测图，它同夏家店下层鬲的相似形态，可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这两个文化的亲缘关系。我看，二者应当是属于一个文化区的。

在我国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过程中，有时在命名了一个文化之后，再命名其不同的区域类型，如仰韶文化及其半坡——庙底沟类型和后岗——大司空村类型等；有时会把有一定相似性的不同文化作为同一个文化来命名，如黄河下游、黄河中游、长江中游的相当于龙山阶段的诸文化，曾被统称为龙山文化；有时所命名的不同文化，可能类似于同一文化的不同区域类型，如寺洼文化与卡约文化；有时还会把应为同一文化不同期别的遗存叫作不同的文化，如半山文化与马厂文化，等等。对任何一个考古学文化的认识，必然要经历一个逐步正确的过程，而牵涉到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一系列概念，又只有展开充分讨论才能比较接近。因此，现在流行的许许多多考古学遗存的称呼法，概念的涵义自然还很不一致。这里所讲夏家店下层文化同岳石文化应属同一文化区的概念，大体类似于仰韶文化的后岗——大司空村和半坡——庙底沟等类型是属于一个文化区那种含义。

把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岳石文化归之于同一文化区，当然不是否认二者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程度，看来要大于夏家店下层的燕山南北这两个类型之间的差异。统观这个文化区内的各遗存，也许需要有三个层次的名称，才能表达出这样的关系。究竟怎样处理才妥当，当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但从已知材料看，这时期从辽西至山东、苏北的滨海地带的文化遗存具有相当共同性这一点，恐怕已到了必须重视的程度了。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渊源这个大家长期关心而迄今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我说一点一般性的看法。这个文化从最初发现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这一带野外工作的总量相当不少，为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还是不够明朗呢？

我想，这可能同两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是到了这个青铜时代的早期阶段，在许多地区，因新工具的使用，生产力有了大进步，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导致了一系列生活用具的剧变。于是，新时代的考古学遗存的面貌，同过去有很大差别，一下子看不出前、后两大阶段文化遗存的联系。还可能因这个变化发生得比较突然，变化的过渡时期比较短暂，所以，当资料的积累不到相当程度时，也不容易看清楚转变过程。这个转变的关节，根据一些已知情况看，不是在青铜时代刚刚到来的最初时节，而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些青铜时代形成的新文化，往往在很长时期内看不清它们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联系。

例如长江下游由良渚文化转变为湖熟文化、马桥遗存的中间环节，不是至今还很不清楚吗？

又如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和寺洼、卡约文化，不是长期以来因差别性太大，大家总是不相信它们有继承关系，只是到不久以前，因在青海东部的大通县、循化县等地积累了一千好几百座墓葬材料后，才开始看出二者的前、后继承关系吗？

二是到了这个青铜时代，由于人们的活动能力加强，许多部落集团发生了征服、扩张、迁移等等可以加强各文化彼此影响的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形成的新文化，就往往是综合了好几支文化的因素而形成，渊源非一。如果单一地从某一个文化来寻找渊源，就可能长期感到头绪不清，门路不明。

就昨天看到的水泉遗址的夏家店下层陶器而言，除了一般常见的筒状鬲、折腹盆那些典型的夏家店下层器物外，还见到一些带堆纹的尊、瓮等大型陶器，还有一种三足陶鼎，都具有很浓的二里头文化风格。这就是说，这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含有一定的二里头文化因素；当然，并不是主体。这个现象，至少表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来源非一，应当从复杂的方面来考虑这种文化的形成。

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同上层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是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的。从陶器的面貌看，上层文化不象是从下层文化发展而来的；从分布的范围看，二者又大体重合。这两个矛盾的现象，亦曾使人们长期困惑。

最近，郭大顺同志找到了一个魏营子类型，认为从陶系看，是属于夏家店上层的，从器形看，应当是上层中最早阶段的。郭大顺同志还以为它表现出了一点把下层同上层连接起来的风格。

昨天，我看到了魏营子的东西。拿它们跟夏家店下层的東西，或者是燕山南北其它早于夏家店上层的東西来比较，感到增加了几点新因素：一是鬲上出现了堆纹口沿；二是出现了带双耳的鬲；三是这种鬲虽然也是袋足的，但有一部分出现了联裆的味道。这些从前在本地区所见不到的因素，是在本地文化发展过程中新产生的，还是受其他文化

影响后才发生的呢？

据我所知，堆纹口沿、双耳发达和联裆味道在东部地区或黄河中游相当于魏营子遗存以前的阶段是见不到的，而在陕西至甘青地区的寺洼、安冈、卡约和周、秦等遗存中是非常发达的，其原生地当在陕西至青海东部。

但燕山南北同这个原生地距离太远了，包括魏营子遗存在内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似乎难以同那个地区接触上。怎样来理解这些新因素的出现呢？

据我所知，近年发现已表明，这种西北青铜文化的某些支系，后来已经跑到了关中的扶风县一带；商周之际，甚至到达晋南之地。向北到何处，还不清楚，如果曾至雁北或内蒙南部，同辽西发生联系，就是十分可能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整体面貌同西北青铜文化显然不是一个系统的，把这些新因素看作是接受外地文化影响的产物，可能还是比较妥当的。

这种上层文化，林沅同志以为是东夷之物，但流行的意见则认为是东胡遗存。我对东胡遗存的看法始终是怀疑的。要推定一种文化的族属，除了要求其年代、分布区和史籍记载中的某些族的活动时代和活动地区重合外，最好要找到其文化面貌同已能判明为某族的一些遗存有或先或后的继承关系。推断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族属，自然也应当考虑到这两个方面。

东胡是一种游牧民族。中国古代除了曾把新疆的一些民族叫做西域胡或大胡以外，只把北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叫胡。陈寅恪还从语音学方面指出“胡本匈奴（Huna）专名，去Na著Hu，故音译曰胡”（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所谓东胡，原意即为匈奴以东的另一支胡人，当时把二者都叫作胡，就是因为经济状况、生活方式和文化面貌是比较接近的。

在汉代至北魏的东胡系统的遗存上，的确可以看到同匈奴的文化面貌是接近的。东胡之族，汉代主要为乌桓、鲜卑两大支。北魏的鲜卑遗物，当然已经受到很强的汉化影响，但1955年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魏墓中出土的鲜卑式双耳铜釜，正是匈奴遗存中特征性很强的一种器物。1959年在内蒙札赉诺尔汉代乌桓墓中出土的铜饰牌，也具有强烈的匈奴饰牌风格。汉代至北魏的乌桓、鲜卑遗物既然同匈奴遗物有很强的相似处，早期的东胡遗存怎么会是同匈奴遗存差别很大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呢？

从经济面貌看，夏家店上层文化是一种兼有农业和畜牧业的经济，这同史籍所记东夷诸族的经济面貌是符合的。

从文化面貌看，夏家店上层文化中的青铜曲刃剑和多纽镜，在辽东至朝鲜半岛也很发达，而这一大片地区只能是东夷的活动区而不会是东胡的居住地。六十年代时平壤的一座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墓中，有这种曲刃剑、多纽镜与一枚“夫租藏君”银印共出，直接说明獐貉之族是大量使用这种东西的，而獐貉正是东夷的一支。

从分布范围看，辽东至朝鲜半岛是东夷的活动区已不用评论，燕山南北地区亦曾是东夷的活动区则需要加一些说明。《诗·大雅·韩奕》说：“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据郑笺及孔疏，周初韩侯所封之地

为韩城，即今山西河津县一带，其北面布有追、貉等族。貉貉即貉，故孔疏引《郑志·答赵商》说：“九貉即九夷也。”郑笺又说：“其后，追也、貉也，为獫狁所逼，稍稍东迁。”孔疏解释为：“貉者，东夷之种，而分居于北，故于此时为韩侯所统。”《鲁颂》云：“‘淮夷蛮貉，莫不率从’，是于鲁僖之时，貉近鲁也。至于汉氏之初，其种皆在东北，于并州之北，无复貉种，故辨之。獫狁之最强，故知为獫夷所逼。”这些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两周时貉地的西界与南界究竟在哪里，但亦约略可知他们认为汉代并州以北曾是貉貉的分布地。今天的朝阳地区正在汉代并州的北界附近，在这一带发现的许多出曲刀剑与多组镜的夏家店上层墓葬，时代往往早到春秋，甚至是西周晚期，象魏营子那种遗存则很可能属于周初左右，而战国中晚期的遗存则很难遇到。在辽东一带，则大量出曲刀剑与多组镜的墓是属于战国的；在朝鲜半岛，又一直可延续到汉代。这种情况，岂不和《韩奕》及郑笺、孔疏所说两周时期貉貉的分布地及其东迁情况有所契合吗？

这样讲，当然不会否认辽东至朝鲜半岛的貉貉遗存有早期的东西，但对于辽西地区在西周至春秋或战国早期曾有东夷活动这一点来说，至少是提出了一个证据。

把夏家店下层文化推测为东夷遗存，并把夏家店上层文化亦推测为东夷遗存，对于这两个文化分布区的重合现象以及它们同东部沿海地区其他同时期文化的相似性，就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了。当然，要确定这一点，还需要对燕山南北至东部沿海地区的这一大片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作仔细的比较分析，并真正找清楚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上层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张忠培谈夏家店上、下层文化 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

我于一九八〇年来过朝阳，这次是第二次。庆发同志给我讲了些情况，又看了些材料，学习上有些收获。这里，我汇报一下学习的主要感受。

水泉遗址发掘面积大，出土陶器上、下层共达千把件，文化面貌和性质是两堆：四、五层是一堆，二、三层是一堆。我看过后，觉得有以下几个问题可以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四、五层还可以细分。关于层的概念，长期以来把层下压的遗迹归并为同一地层，如一地层下压一个灰坑，此灰坑又打破一地层，从层位看，应视为三个时期。中间的灰坑，算上层还是下层，还是一单独的时期，就要从它包含物进行认真的类型学分析来考虑。水泉遗址不完全是地层间的迭压，有地层和房址等遗迹迭压的情况，所以，从层位上还可以再考虑它们之间的分期。从文化内涵看，也不单一，如篮纹陶器，共存有鬲，有没有不出篮纹，只出绳纹的。能否把出篮纹、绳纹陶器的单位和